

创业维艰毁誉多

——项英与皖南事变前的新四军(九)

(解放军)
胡居成

面对叶挺的辞职出走

1938年10月初,正在延安参加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的项英,接到中共中央长江局转来的叶挺于9月30日给他的电报。电报的要点是:“我军在战局激变中与各军关系更为复杂,且部队整训实属繁重,原非我独立所能处理”;“你离部之期已远逾叔时之约,恳即从速南归”;“我拟于下月初赴顾(即顾祝同)处一行,如能请准假,则返香港,观察各方情形。你何日回,盼即告之”。

项英是7月28日离开军部去武汉长江局述职的,原计划几日后返回,因中共中央要开六届六中全会,王明要他代表长江局去作会议的准备工作的,便直接由武汉乘飞机到西安,转赴延安。而新四军自从进入敌后,对日作战捷报频传,队伍扩大,装备更新,群众威望越来越高。这引起了国民党军政当局和第三战区长官部及苏、皖两省地方当局的严重不安。

开始,新四军几个支队与敌交战获胜,他们都致电祝贺。谁知新四军越打越好。“八·一三”上海抗战一周年纪念日,陈毅进攻日军大据点句容县城,毙伤日伪军40余人,缴获步枪数十支,粟裕打到了芜湖城下,谭震林打到了铜陵、繁昌前线的长江边;9月12日,高敬亭在花子岗一次伏击摧毁日军汽车51辆,毙日军80余人……这些联翩而来的捷报,使顾祝同好几个夜晚睡不安稳,国共合作出现了微妙的变化。日军由于接连不断受到新四军的袭击,出于报复,分别于8月22日和9月11日,集中4000余人、20余架飞机,分别对二支队活动地区和一支队驻地进行“扫荡”,仗越打越大,也越打越复杂。叶挺感到在这种情况下,项英离军两月不归,是不应该的。同时,叶挺不同项英作任何商量,单方面宣布将向顾祝同请假,到香港去观察各方情形,要项英速归;这表明叶挺要辞职,离开军部去香港,要项英回去接替工作。

项英将叶挺的电报分别给毛泽东、王明、

周恩来看了,并一起研究解决问题的办法。其实王明、周恩来在来延安参加六届六中全会前,已接到叶挺从云岭军部发来的辞职电报。8月28日,周恩来给叶挺发了挽留电。电文中说:“项英同志已赴延安,我们不日也往延安开会。关于新四军工作,请兄实际负责。”“当前战役已到紧急关头,兄必须到前方督战,万万勿误。我们深知兄在工作中感觉有困难,请告明。我们正帮助你克服这一困难。延安会毕,我们拟来一人帮助整理四军工作。”叶挺看了周恩来电报后,虽然在新四军中又留了一些时间,但离军的念头仍难以打消,9月30日,又电催项英速回新四军。

经毛泽东、王明、周恩来一起研究,同意项英提前离开延安,回皖南军部,对叶挺再作进一步挽留。项英致电叶挺:“陕北秋雨不断,武汉交通不保,回时须绕道,如能乘飞机,当可在下月半抵军部。”

10月初,项英离开延安,因武汉战事紧张,交通受到影响,项英在途中辗转半月有余,直到10月22日才回到皖南云岭军部。当天晚上,项英、叶挺相见,彼此互道“辛苦”,握手之后,一时都不知从何谈起,他们之间是有些矛盾和恩恩怨怨,但相见时又都难以启齿。

在新四军创建初期,叶挺与项英在新四军的改编、组建、集结、整训等工作中,有过密切的配合,亲密的合作。这一时期,他们的分工很明确,叶挺主要管外,跟国民党打交道,争取港澳和海外侨胞的支援等,军内工作则侧重军事训练、作战指挥。项英主要管内,跟中共中央、长江局打交道,军内主要抓干部配备,党的建设等。他们从不同的方面为新四军抗日作贡献。

叶挺和项英的分歧,是新四军在皖南集结后,向敌后挺进的路线上开始的。第三战区要新四军“出南陵,依大茅山脉向芜、宣”行动。去屯溪接受任务的叶挺认为可以,“无甚理由拒绝”。项英则认为“不能接受,显系借刀杀人”。他3月18日致电毛泽东、王明、周恩来说:“我

意,由叶办不能具体解决,蒋压迫,叶不能反抗,应由党负责直接交涉。新四军因党不出面,以间接方式解决,使问题愈弄愈棘手。”项英把军长叶挺跟第三战区交涉说成是“间接方式”,说明他对叶挺不信任。这以后,项英在新四军具体开进路线、时间和防区划分等问题上,和毛泽东也产生了分歧,在电报来往的磋商中,项英认为这是党内的事,因而避开叶挺,不征求他的意见,也不向他通报党中央、毛泽东的有关指示,好象这是“党的机密”,叶挺这个“党外人士”、“统战对象”不可与闻似的。

叶挺也是一个自尊心很强、性情很倔的人。1927年广州起义失败之后,他不屈从中央代表李立三和驻共产国际代表王明的压制而愤然脱党出走。对这个“一失足成千古恨”的脱党行为,叶挺十分后悔,认为这是“人生路上的一大曲折”,任新四军军长后,他不止一次地用“爬山折回去”和“又跟上来”这个生动比喻,公开向党中央和新四军广大指战员表示,他对过去一段时间消极彷徨的悔恨,以及今后不怕山高、路远,坚持抗战到底的决心。他一直认为,他的脱党是一个“失误”,是由于错误的党内斗争和自己的意气用事而形成的“失误”,绝非什么变节行为。假若有什么人特别是项英这样的负责人,把他视为“革命的逃兵”,因而不信任他,那就是对他人格的不尊重。

尽管如此,叶挺已不像10年前那样爱意气用事了,他用理智约束自己,竭力把项英当作党的领导那样予以尊重,避免发生太多的矛盾。为了能够更多地参与对新四军的领导和军政建设,6月上旬,叶挺借去武汉要求增加军费之机,向中央代表团和长江局提出,在新四军组织一个委员会,以便共同商议和处理一切军政问题。长江局和党中央了解叶挺的良苦用心,仅3天就批了下来,“同意组织新四军委员会,以项、叶、陈、张、周、袁为委员,项为主任,叶为副之”。这仅能解决叶挺参与新四军军政问题的研究,最后拍板的仍是项英,因为他是“主任”。

项英自对叶挺产生不信任感之后,对叶挺的日常工作和生活方式,也有点看不顺眼了。叶挺到部队指导工作,喜欢骑马,以马代步,而且带的随行人员——副官、参谋、卫士等比较多,行动起来前呼后拥一大帮。项英认为这是摆官架子,旧军人作风,不符合红军官兵一致的光荣传统,影响团结。叶挺注意仪表穿着整洁,平时不是穿黄呢将军服,就是穿皮夹克、西装等便衣,对新四军的布料深灰色制式军装,他极少去穿。项英认为叶挺不穿新四军军装是对新四军没有感情。叶挺当时单独吃小灶,还从广东带来一个为他办伙食的厨师。项英对叶挺吃小灶,开始还可以原谅。二人产生间隙之后,项英认为这是搞特殊化,不能和大家一起实行“艰苦奋斗”。叶挺还有一大爱好——照

像。当时,他有一架德国造的高级照像机,凡行军战斗,外出巡访,宾来宾往和军民集会等等,他总爱照些纪念照片,或送报刊发表,或存作军史资料。对这一活动,项英似乎也有微词,认为这不是无产阶级生活作风。

党中央、毛泽东早在二三月份就从项英的电报中发觉他对叶挺有些不满,因此,在来往电报中多次叮嘱:“对新四军的政治领导不能改变,但应尊重叶挺的地位和作用”,“军事指挥叫叶挺来办”,“在新四军中进行教育,以确定对叶挺的正确关系,叶挺工作问题的解决,将影响新四军的前途,全国同情对我之态度,关系也极大”,“请始终保持与叶挺同志的良好关系”。可以说,党中央、毛泽东为促进项英主动地团结叶挺共举大事,是做了许多工作的。

但是,项英由于对叶挺产生了不信任感,对党中央、毛泽东再三再四的嘱咐,并没有真正听进去。他一想到叶挺自动脱党,想到3年游击战争中那些自首变节分子给党和游击队带来的危害,心里就像吞了个苍蝇一样的不舒服!再想到在国共合作抗日谈判中,蒋介石对八路军多一个团的编制都不给,而却同意叶挺把南方游击队编成一个军,其目的,不就是要借他的老部下之手,把经过3年苦斗的红军游击队战士搞掉吗?即使叶挺无此意,一心抗日,蒋介石是肯定有这意图的。叶挺受蒋介石的压迫,不敢反抗,我怎么可以信任他,怎么可以把新四军的决策权交给他!我要对党负责,对新四军广大指战员负责啊!因此,虽然党中央、毛泽东屡次提醒,又成立了新四军委员会,叶挺的地位和作用并未受到尊重,项英个人说了算的局面并未改变。叶挺除向三战区和国民党当局要点经费和联络一些事情之外,仍然无事可做,感到军长头衔空有其名,难行军长之职,英雄无用武之地,便产生了离之而去的想法。

叶挺和项英之间的这些问题,对上可以说,但在彼此之间,如何讲得出来呢!他们见面之后,项英传达了毛泽东、周恩来向他问好,叶挺表示感谢,也简要地谈了一下部队两个月来的战斗、发展情况和需要紧急处理的问题,然后将已于昨日正式向顾祝同提出“给假一个月休养”,并“准予免去军长一职”的副本递给项英看。第二天,10月23日,项英向毛泽东、王明、周恩来报告:“叶之辞职愈坚,本问题无可挽回。目前四军问题应直接由周恩来与蒋解决继任人。以后四军与八路军共同由党直接解决各种问题,才是根本办法。”对叶挺为什么要辞职出走,项英没作任何反省,似乎叶挺离开新四军是项英意料之中的事,所以他立即提出叶挺之后的“继任人”问题,并主张新四军今后不要通过像叶挺这样的非共产党人和国民党打交道,暗示他可以当军长,直接解决一切问题。

(责编 启元)